

辽宁大凌河上游流域考古调查简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
美国夏威夷大学

关键词: 辽宁 大凌河上游 红山文化 区域考古调查 社区

KEYWORDS: Liaoning Upper Reach of Daling River Hongshan Culture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Survey Community

ABSTRACT: In 2009, the institutions from China and the U·S· conducted the first term of cooperative archaeological survey for “the Liaoning Hongshan Period Community Project”. Based on the present theory abou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ongshan Culture, this survey was an on-foot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aimed on figuring out the scale and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population in the surveyed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Hongshan Culture.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suggested that at that time, the community was composed of many administrative areas which had interactive relations but the high-developed communities with unifi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had not appeared. This survey is helpful for the explora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rites and economy in social complexity.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作研究协议,项目名称为“辽宁红山文化社区项目”(The Liaoning Hongshan Period Community Project)。项目旨在运用考古学特有的野外调查技术与方法,重点研究红山文化遗存的分布规律,探讨其社会组织结构与发展动力,关注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深入了解早期复杂社会的成因和发展过程。为此,双方组建联合考古调查队,在辽宁西部的大凌河上游流域开展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

2009年5月中旬至7月上旬,中美联合考古调查队在大凌河上游流域开展了第一季田野调查工作。调查区域以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为中心,包括了大凌河两岸平坦的冲积滩地、起伏平缓的高地以及地势较

陡的山区。调查区主要分布在大凌河西岸,总面积约205平方公里。其中主体调查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验证性调查区面积约5平方公里(图一)。现将此次田野考古调查的学术背景、调查方法、调查收获以及初步研究成果简报如下。

一、项目背景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广大的东亚地区兴起了几个具有复杂社会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它们相互独立又皆以粟作或稻作农业为基础,包括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以及辽河、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严文明先生称之为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1]。尽管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并不完全相同,但它



图一 调查范围示意图

们都属于最初的一批以等级制度原则组织起来的大规模群体，都可以笼统地称为酋邦，是东亚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典型。

与其他四个考古学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个性鲜明。从规模巨大的墓葬、礼仪建筑等考古发现来看，红山文化复杂程度较高。但其中未发现大型的中心聚落、巨大的围墙和壕沟，也没有属于精英阶层的结构复杂的高等级居住建筑。红山文化的发展动力可能是宗教和礼仪，而不是经济和军事。

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起始于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地区，突破在辽宁西部的朝阳地区。经过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深入研究，我们对红山文化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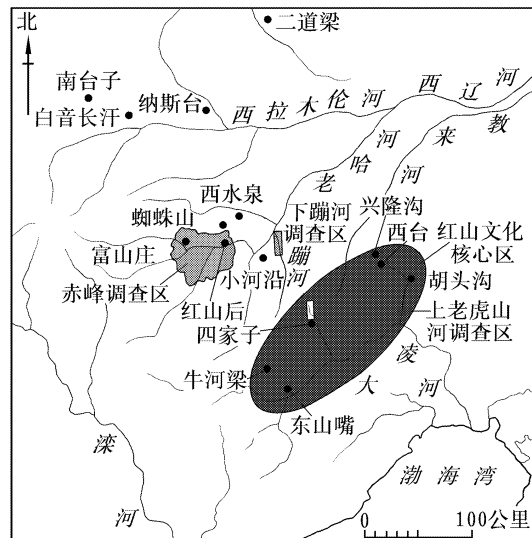
(一) 红山文化的核心区

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将牛河梁、东山嘴遗址到胡头沟墓地之间的区域认定为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图二)。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的中心。根据最新的文物普查成果，50 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 40 多个遗址点。神庙、祭坛、积石冢群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主体是一个具有神庙性质的建筑和一个大型平台，此外还有仓库性质的附属建筑、祭祀坑、灰坑等^[2]。第二地点^[3]、第三地点^[4]、第五地点^[5]、第十六地点^[6]均为积石冢。这些积石冢或圆或方，规模巨大。尤以第二地点积石冢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随葬品最丰富。第十三地点则很可能是一个具有祭坛性质的大型建筑^[7]。

东山嘴遗址位于牛河梁遗址东南约 30 公里，坐落在大凌河西岸台地上，面对大凌河开阔的河川和山口，居高临下，很有气势。遗址北部是一个大型石筑方形基址，南部有多个圆形石圈，出土了一批祭祀陶器和玉器，尤其是陶人像令人印象深刻^[8]。

胡头沟墓地位于牛河梁遗址东北约 150 公里的牯牛河东岸断崖上^[9]。此处发现了一个红山文化大型积石冢、两座红山文化墓葬，出土了 18 件玉器。在核心区内，除上述著名遗址和墓地外，在老虎山河调查区^[10]、敖汉旗^[11]及朝阳地区最近的文物普查中，还发现了较多的积石冢和祭祀遗



图二 红山文化核心区和周边区的主要遗址与调查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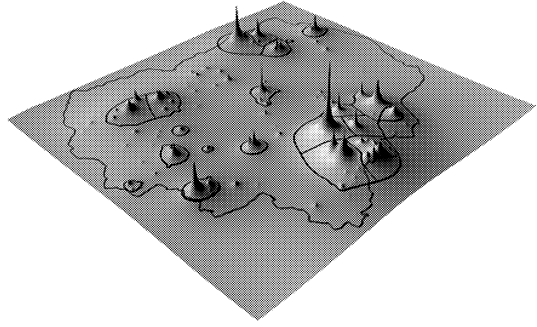
迹。

核心区规模巨大的礼仪建筑和墓葬,让人们感觉到红山社会高度的政治统一。只有少部分人被埋葬在积石冢内并随葬精美玉器,这些人必然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红山社会已经产生阶层分化。由于玉器具有通神的属性,所以这些墓葬的主人通常被认为不仅掌握神权,而且还掌握政权。精雕细琢的玉器和数量众多、彩绘纹饰丰富神秘的陶器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工的细化。玉器的雕琢和彩陶的制作需要高超的技巧,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而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专业技术工匠队伍的存在,说明在红山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很可能也已经专门化了。领导者通过礼仪或宗教获得权力和财富,经济方面不同群体则因社会分工的细化而互相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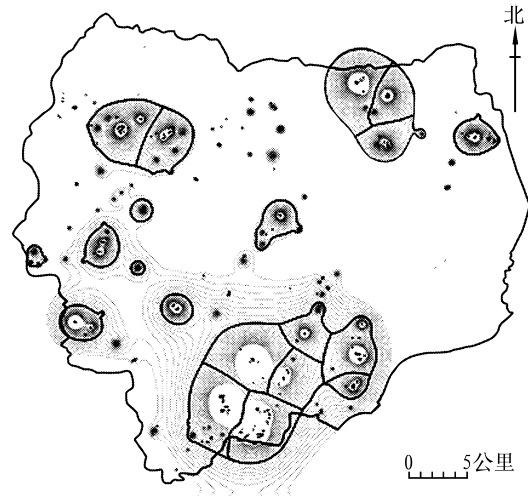
红山文化核心区的礼仪建筑、积石冢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但我们对核心区内的日常生活遗存却知之甚少。例如,敖汉旗西台遗址、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小型环壕聚落,房址为半地穴式,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面积 20 平方米左右。灶坑位于房址中央,窖穴分布在房屋外围^[12]。

(二)红山文化的周边区

核心区之外的周边区,关于红山社区(community)的信息就丰富得多。相关考古资料主要来自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地区(见图二)。在蹦河下游的小规模考古调查显示,这里存在着一到两个小的政治单元(polity)^[13]。在赤峰附近的一项覆盖 1234 平方公里的系统性区域聚落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的村庄已经组成了一种超地方社区(supra-local community)或行政区(district)^[14]。这些行政区横跨 2~5 公里,由多至 10 个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y)组成,中心位置通常是一个较大的社区。这些行政区不超过 500 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型政治单元,互不隶属,没有等级差别(图三;图四)。



图三 赤峰调查区人口分布图(为经平坦化处理的人口地形图)



图四 赤峰调查区行政区图

在赤峰地区,许多红山文化居住遗址被发掘,包括红山后^[15]、蜘蛛山^[16]、西水泉^[17]、小河沿^[18]、白音长汗^[19]、南台子^[20]、纳斯台^[21]、二道梁^[22]等。这里绝大多数房址的形制、大小与核心区的房址相同。然而西水泉和白音长汗遗址有少量相当大的房址,面积 50~100 平方米。这些大房址可能是高等级家庭的居所。在蹦河下游的 6384 号遗址,房址的灰土圈显露在地表,直径 4~5 米。52 个房址成多排分布在 0.5 公顷的范围内。这些房址可能是由夫妻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的住所,每排或每群可能代表一个超家庭的血缘组织^[23]。通过发掘、采集获得的人工制品和生物标本,我们发现红山人从事多种经济活动,包括种植粟及其他谷物,采集植物果实、根茎,饲养猪、羊,狩猎鹿等动物,从事纺

织、皮革加工、陶器和石器制作等。

富山庄遗址是赤峰地区一个典型的红山文化行政区的中心,通过深入研究这个面积达 35 公顷的遗址,我们获得了红山社区的具体信息^[24]。经过分析遗址地表采集的各类人工制品,我们发现一些房址中带纹饰的夹砂陶器比例较高,另一些涂陶衣但较少装饰的泥质陶器比例较高;一些有高比例的石铲、锄、犁、斧、镑、磨盘和磨棒;另一些有高比例的石片、石片废料、石核、石钻、雕刻器、石镞;还有一些有高比例的双面切料、石锤、磨石、削片和砍切工具。这三类不同的生产工具组合以及它们在不同房址中的比例差别说明红山社区中出现了生产分工。除了生活遗存之外,富山庄遗址还有四个土石混筑的积石冢,周围分布大量的彩陶筒形器片。四个积石冢分别位于一个开放式的中心广场的四个角上,社区的房屋围绕广场建造。显然,富山庄遗址也有红山文化核心区那类祭祀遗存,只是规模要小很多。

南台子和白音长汗遗址发掘了几座土坑墓和简单的石板墓,这些墓葬以随葬生活用品和个人饰品为主^[25]。随葬品有多有少,有的甚至没有随葬品。日用随葬品的多寡并不说明存在贫富差异,而是表明经济福利的不同。这种解释与富山庄遗址中每个家庭生产工具组合的变化所暗示的完全一致。做工精细、涂有陶衣的陶器很可能是每个家庭渴望拥有的财产,出土较多这类陶器的家庭可能享有很高的生活标准。

赤峰地区的区域性聚落研究、富山庄遗址的地表采集和南台子、白音长汗等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红山文化社区信息。家庭单位的社会地位分化可能遵循着财富和威望两条主线,也有可能按照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进行。这些家庭聚集成地方社区,分布或很紧密,或很分散。

(三)红山文化的社会发展动力

红山文化的礼仪建筑表明礼仪活动是

居于首位的,意识形态成为早期超地方社区向心力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心社区家庭的生产分化趋势已经很强,从某些方面使外围地区居民成为从中心社区获得货物和服务的消费者,促成了中心社区与外围地区居民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这表明红山社会共存两种独立的社会等级制度,一种植根于日常经济动力,另一种基于礼仪权力。这种对江山社会变化动力的解释强调社会权力的两个基础——意识形态和经济控制,而非军事和政治权力^[26]。在众多早期复杂社会中,上述权力因素的重要性各异,相互作用的状况也各不相同,而且这些因素不可能在同一个地区同时起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红山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经济结合的程度有多大。

牛河梁、东山嘴遗址发现的礼仪建筑规模巨大。积石冢数量较多,分布密集,结构更复杂,使用石料更多,筒形彩陶器形体大、数量多。然而关于红山文化家庭、地方社区和小型政治单元的绝大多数考古证据都来自周边区。关于村庄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家庭活动的解释都严重依赖富山庄遗址——一个小型周边政治单元的中心。这些关于红山社会的解释混合了核心区的大规模礼仪建筑和周边区的家庭、社区方面的证据,是非常有风险的拼凑。

用周边区政治单元的活动和组织模式来揣度核心区的礼仪性遗址,就会不自觉地认为二者很相像。然而,核心区与周边区截然不同,它的公共建筑数量大、形式多、规模大。这样就会使人认为,核心区政治单元在某些方面比周边政治单元更发达。也许它们人口更多,占有空间更大,更具有中央集权特性。一个或多个超地方社区可能控制了周边区域,把它们纳入一个更大规模、更多阶层的政治单元。更多的人口可以为建设礼仪建筑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人参与礼仪活动又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分化。数量大、密度高的人口可以使更复杂的组织问题

得到解决。然而,任何一个核心区政治单元都大于周边区域政治单元的说法只能是推测。一方面,礼仪建筑标志着所在地没有居民,远离生活社区,可能只是朝觐的圣地。另一方面,核心区的公共建筑经历了长期的重建和扩建,其过程甚至可能长达千年。依据上述考古表象得出的结论是核心区的政治单元都很大,都高度发达。因此,搞清围绕核心区礼仪遗迹的社区的规模很重要。

与富山庄遗址给我们的启示相比,核心区的大量积石冢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更大的生产分化的景象。更强的生产分化会产生更大的经济不均,扩大了野心勃勃的精英阶层的机会,进而推动核心区更大的发展。这与权力的最有力和灵活的基础存在于经济活动的理论相一致^[27]。更多生产分化意味着家庭之间更大的经济依存,更多的村落有着更高层次的社会互动。这又与日常经济产生强大社会向心力的理论相一致^[28]。

在红山文化这种小型社会中,斯皮尔曼(Spielmann)所谓的礼仪生产模式可能很重要^[29],并且生产祭祀用品的技能与提升祭祀领导者的威望密切相关。有时,这些祭祀用品是由精英阶层自己生产的。这类生产的直接影响在社会层面而不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层面,在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其影响可能更强烈。比如,玉料的获得可能有更广泛的地理含义,虽然红山文化的玉料产地还不清楚,但很可能来自远方,这促进了与周边区的联系。红山社会存在着生产分化、经济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虽然渔猎、采集对红山社会的食物供给做了重要贡献,但是聚落的位置、动植物遗存和人工制品组合都证明,无论是在核心区还是周边区,发达的农业生产都最为重要。食物资源在复杂社会的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核心区和周边区差别的根源也许可以在这里找到。而核心区和周边区在自然资源和人工生产食物方面差别不大。周边区并不存

在食物资源方面的压力,至少在经过调查的赤峰地区是这样,那里的人口密度小于每平方公里4人。核心区也不存在这方面的压力,除非其人口密度大大高于周边区。即使存在资源压力,也没有证据表明由此导致了严重冲突,但这可能会扩大精英阶层利用自身优势来控制食物产品的机会。

与周边区相比,红山文化核心区如何会有这样超大规模的礼仪建筑群?这一问题理解红山社会发展动力的核心。上面列举了一些解释核心区和周边区差别的理论,筛选这些理论,也是对促成早期复杂社会出现的要素进行评估。

二、调查方法与收获

(一)调查方法

以东山嘴遗址为中心的系统性全覆盖徒步考古调查完全遵循标准程序。这里以农田为主,所以地表可视条件非常好。调查时使用比例为五千分之一、分辨率为2.5米的卫星影像片,很容易精确定位。我们设想地面被分割成大致50米×50米的方格,调查队员以50米间距行走,相当于每名队员都走在50米方格的中心线上。如果一名队员在50米距离内发现2块陶片,那么这个50米方格即定为一个采集单位。

如果在2平方米范围内有1块或1块以上陶片,我们要作系统的地表采集(不只是某一点的陶片密度高,而是在较大范围内陶片密度高)。在50米×50米的采集单位中心,划一个半径约1.8米的圆圈(约10平方米),采集地表所有陶片,但不包括石器和其他遗物。如果采集的陶片少于20块,则在采集单位最远的一个角划另一个圆圈进行采集。如果仍然少于20块,则在另一个角再划一个圆圈采集,直到采集到20块以上陶片,但最多划5个圆圈。

如果陶片密度小于每2平方米1片,就做一般性采集。因为这样的低密度,即使

5个系统采集圈也达不到20块陶片。队员们在50米×50米的采集单位内采集所有发现的陶片,当采集到25块陶片时即停止,或是有多少取多少。

在卫星影像片上画出采集单位的边界,写下采集单位的号码,填好采集表。注明采集遗物口袋的数量,通常只有1袋陶片。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不采集石器及其他遗物。如有特殊情况,要注明“其他”遗物的数量。如果发现与采集单位有关的地表遗迹或其他相关情况,要在“相关遗迹”栏里注明。

如果地表遗迹非常丰富,需要在坐标纸上加以描述并画草图。每个采集单位的边界、号码都要标出,以便确定遗迹的位置及其与地面采集的关系。在采集表的“相关遗迹”栏里注明存在有关的描述和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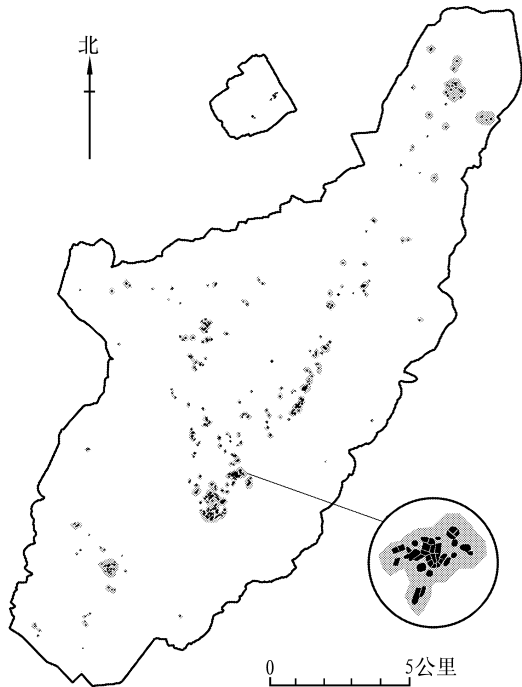
这种方法为整个调查区域内的每个采集单位及各个时期地表陶片的密度提供了合理的度量。调查的目的不是标记遗址,而是系统记录地表上现存的考古遗存,用于统计分析社区模式,估算人口数量。

(二)调查收获

本次调查共确定了2853个采集单位。结合以往研究与初步统计分析采集的陶片,我们确立了采集区域的考古年代序列。

1. 红山文化(公元前4500至前3000年) 红山遗存数量丰富,散布在整个调查区域,特别显著的集中在四、五个地点(图五)。采集红山文化陶片2466块,采集单位总面积75公顷。运用区域密度指数法^[30]得到红山时期人口约为750~1500人。

2. 小河沿文化(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 在东山嘴调查区,衔接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是小河沿文化。但是采集到属于这一时期的陶片很少,只有7块。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在1000年里这一大块区域是人类活动的空白。很有可能有一些我们认定为红山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片应该属于这一时期。若果真如此,红山和夏家店



图五 东山嘴调查区红山文化遗存分布
(灰色阴影表示由采集单位构成的地方社区)

下层文化的人口数量应该调低。

3. 夏家店下层文化(公元前2000至前1200年) 虽然遗存仍集中在四、五个地点,但是分布形态更加分散。采集夏家店下层文化陶片共4091块,采集单位总面积143公顷。人口显著增加,达到4000~8000人。

4. 夏家店上层文化(公元前1200至前600年) 遗存分布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比,有一点改变。采集夏家店上层文化陶片5792块,采集单位总面积158公顷。在这一时期,人口数量达到最高点,约8000~16000人。

5. 战国至汉代(公元前600至公元200年) 遗存分布更分散,分布区从河谷边缘退回到高地。采集战国至汉代陶片共3910块,采集单位总面积221公顷。人口数量估计为3000~6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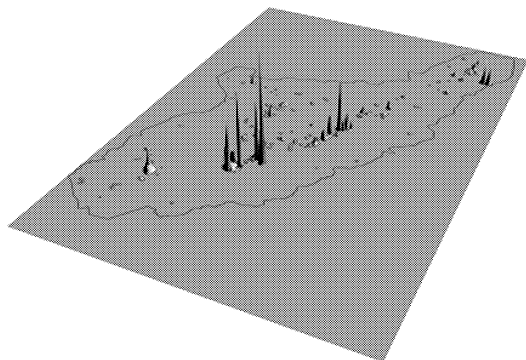
6. 汉代以后(公元200至1300年) 遗存分布比战国至汉时期还要分散。采集的

陶片以辽代为主,共 4002 块,采集单位总面积 292 公顷。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约 1500~3000 人。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人口规模重建

一方面,估算的红山时期的人口数量看起来确实很大。在东山嘴调查区,处于最早阶段的红山文化人口达到了很大规模,足有辽代人口的一半。但另一方面,在大凌河两岸长达 29 公里的调查区域内,750~1500 的人口规模并不算多。在代表人口分布的未经平坦化处理的地图上,成群分布的采集单位可以被区分为 100 个左右的小型地方社区(图六)。至少一半这样的地方社区可能只是一两个家庭的小农庄。其他社区人口多一些,属于小村庄,其中几个村庄的人口有 100 多。这些较大的社区都过于分散,它们的分布范围横跨 1 公里,甚至更大。基于距离-互动原则是揭示社区模式的核心,这些分散地方社区居民的日常互动行为足以认定它们确实是社区,但是又没有紧密型核心家庭村庄那样强烈。一些红山文化的村庄分布紧凑,并以核心家庭为主(如白音长汗、下蹦蹦河流域 6384 号遗址)。但在东山嘴调查区,红山遗存在地表散布的特性及相对低的密度,并不支持这些地方社区有很强的聚集性,这种情况在赤峰地区也一样。因此,可以说聚集型的红山村落是非典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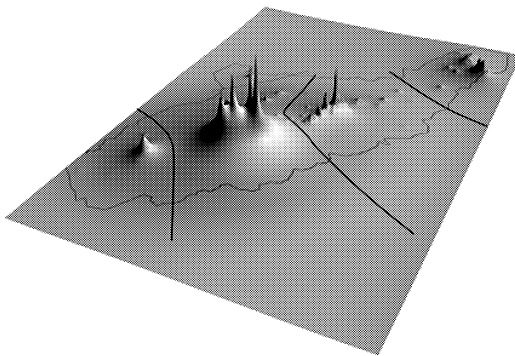


图六 东山嘴调查区由采集单位构成的地方社区
(表面未经平坦化处理)

红山文化时期,东山嘴调查区的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公里 10 人。虽然其人口密度是赤峰地区的两三倍,但还远远不会对周边资源产生压力。在赤峰地区,人口数量在接下来的两千年大爆发,很可能达到每平方公里 100 人^[31]。即使这样大的人口密度,通过比红山时期稍微进步的农业技术就能满足需求。很明显,红山文化核心区的人口密度并不比周边高很多,也就不存在人口压力。

红山文化研究中一直令人烦恼的问题是其时代长达 1500 年,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却无法进行精确的年代控制。例如,对东山嘴调查区红山文化时期人口的估算就是把所有红山文化遗存累计在一起进行的,同时,把这一时间跨度均分为 15 个世纪。很容易猜想,人口数量在文化发展初期要低于平均估值,后期要高于平均估值。与这一猜想相一致的事实是,大多数红山文化的测年数据属于晚期阶段,而且无论在赤峰还是在东山嘴调查区,晚期人口数量大大增加。

即使红山文化晚期人口数量大大高于平均估值,但是与大汶口和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超地方社区的人口规模相比,红山文化行政区的人口规模小得多。与大多数出现社会阶层分化和礼仪建筑的世界其他地区早期酋邦相比,红山文化时期的人口也要少得多。在新大陆,早、中形成期的墨西哥瓦哈卡(Oaxaca)山谷就有一个 2000 人左右的独立



图七 东山嘴调查区行政区与人口分布图
(表面已经平坦化处理)

政治单元。其他的著名案例包括：哥伦比亚的马格达莱纳（the Alto Magdalena）、墨西哥的墨西哥盆地美国的黑武士山谷（the Black Warrior Valley）、卡霍基亚（Cahokia）和夏威夷，这些行政区的人口从四、五千到几万不等^[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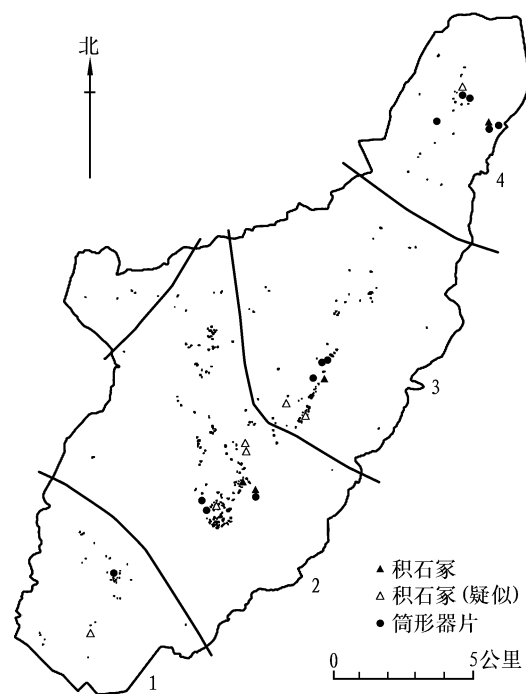
（二）社区组织特征

在经过平坦化处理的东山嘴调查区红山遗存分布图上，大约 100 个地方社区群可划分为四个超地方社区或行政区（图七）。在大调查区西北部单独的小调查区，可能存在第五个行政区。

在区域组织方面，与赤峰地区类似，规模大、人口密度高、分布更紧凑的地方社区都位于每个行政区的中心。四个行政区的中心都有红山时期的礼仪建筑遗存。在四个行政区的中心采集单位都采集到大量彩陶筒形器片（图八）。因此，虽然地表毫无迹象，也可推知这里存在积石冢。东山嘴调查区提供了核心区礼仪建筑的资料证明了核心区礼仪行为高度发展的特点：与周边区相比，中心区的礼仪建筑数量更多、更复杂、更多变化、分布密度更大。然而，它们的社会作用和背景与赤峰地区的同类遗迹极为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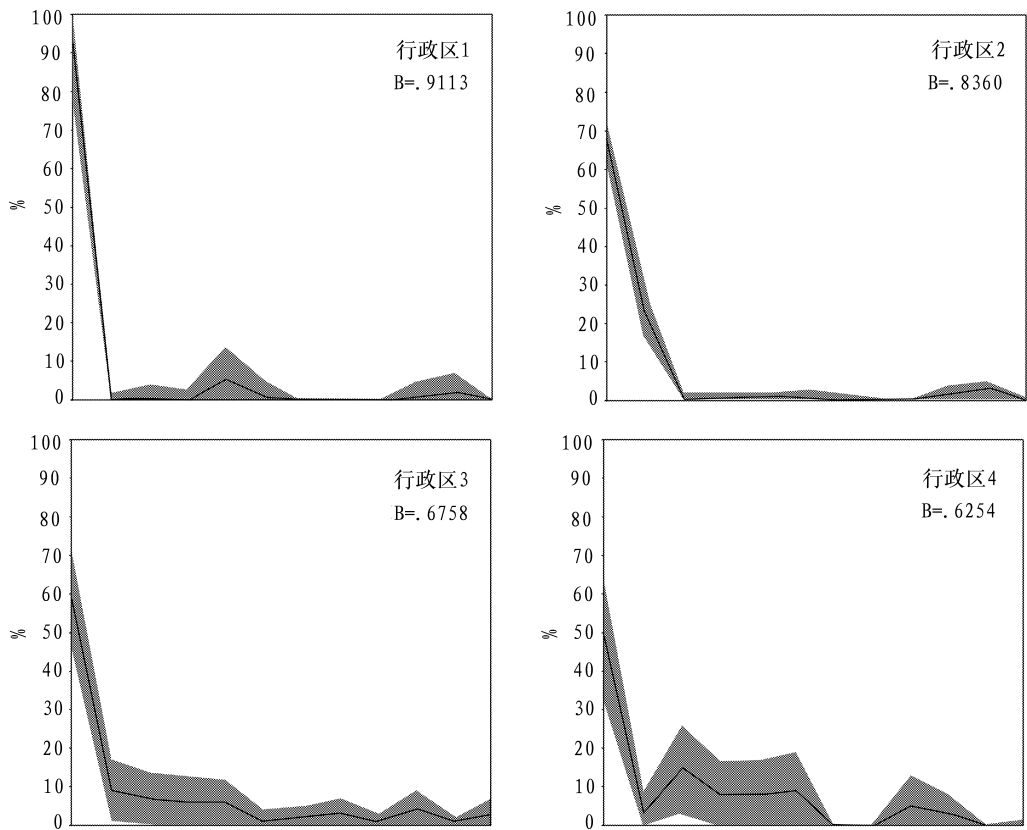
就性质而言，东山嘴和赤峰地区的超地方社区表现出相同的社会现象，只是东山嘴的行政区在礼仪方面表现得更复杂。因此，有理由怀疑核心区的行政区规模更大、人口更多的观点。就分布范围而言，核心区的行政区比赤峰地区的稍大一点，前者范围是 4~8 公里，后者为 3~5 公里。在两个地区内，每一个行政区的人口数量相差很大（见图三；图七）。赤峰地区的这些行政区被理解为独立的政治单元，没有一个行政区的中心规模突出，可以控制其他行政区。在空间方面，没有一个拥有很大中心地带的行政区被小行政区所环绕，通常这种小的行政区是整体的区域经济体和政治结构的次级单元。

东山嘴调查区只有四个行政区，所以它



图八 四个红山文化行政区

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明晰。但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这里并不存在包含多个行政区的更高层级的政治、经济结合体。显然，包含东山嘴遗址的 2 号行政区人口最多，东山嘴遗址也具有很强的向心力，聚合了几公里内的社区，但是它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区域性中心。虽然在祭祀遗迹周围分布着许多生活遗存，它只是 2 号行政区四个峰值中的一个（见图七）。这些峰值对应着四个独立的大型而散布的地方社区，它们的规模大致相等（没有一个大于 3 号行政区中最大的地方社区）。公共建筑并不集中在任何一个社区，而是分散在整个行政区。因此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候选者可以作为支配整个大区域的中心。此外，如果这四个行政区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广泛结合，那么他们分布空间的分离性也超出了我们的预计。没有迹象表明整个调查区的人口被吸引到 2 号行政区的某个中心。每个行政区都有自己的礼仪设施，功能基本相同。所有行政区都是高度集中的，人口向中心区集中。当它们的集中度用 B 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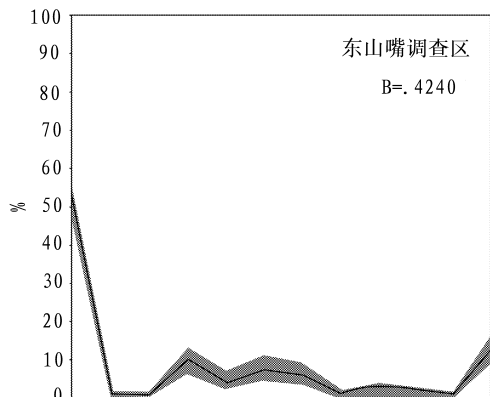
图九 东山嘴调查区四个红山文化行政区集中度图表(90%置信度)
(最大集中度的B值为1.0000,最小集中度的B值为0.0000)

数^[33]来衡量时,数值从1号行政区的0.91回落到4号行政区的0.63(图九)。如果整个调查区是一个政治单元,则其B值仅为0.42(图一○)。这正表明这些行政区并没有结合成单一的区域性政治或经济体。

虽然行政区之间的政治或经济一体化明显不足,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互动。毕竟具有红山文化风格的陶器和其他物质文化不仅在这四个行政区内共享,而且也被几百公里外的红山人共享。每个行政区的人口数量不足以维持自身繁衍,因此一定存在跨区婚姻。一些社会互动跨越了行政区界限。但是行政区之间的互动并不显著,性质与行政区内部的互动也不相同。一种区内互动形式很可能是礼仪性的。由于东山嘴祭祀建筑群是调查区内唯一经过发掘的,所以很

难与其他同类遗迹比较。但由于该遗址有复杂的礼仪设施,参加礼仪活动者可能来自调查区内其他行政区甚至更远。

在东山嘴调查区,行政区的人口规模和



图一 东山嘴调查区集中度图表(90%置信度)
(最大集中度的B值为1.0000,最小集中度的B值为0.0000)

公共建筑的丰富程度明确对应。如上所述,2号行政区拥有最大的人口数量和最多的礼仪设施。3号行政区排在第二位。接下来是1、4号行政区,人口数量少,公共建筑也少。然而在赤峰地区,行政区的人口数量变化很大,红山时期的公共建筑遗存也很少见。此种关联即使存在,也难以发觉。作为核心区和周边区的对照,东山嘴调查区支持核心区的建筑更为复杂的观点,但是这里的行政区并没有更多的人口。行政区的人口大约100~500人,或稍多一点,与赤峰地区相似。因此,核心区更精致的祭祀遗存并不是源于更大的人口规模,更多的劳动力或是更迫切的社会整合需要。

四、总 结

通过系统的聚落形态研究,可知红山文化核心区的地方社区和超地方社区的发展模式与已知的周边区非常相像。大量的农舍散布在地表,但大多数人口集中在较大的地方社区。这些地方社区不是布局紧密的村庄,而是延伸达几百米的分散集合体。地方社区组合成多个行政区,之间有互动关系,但看起来没有政治结合。每个行政区都有独立的礼仪设施,最大行政区的人口也不比周边行政区的人口多很多。红山文化核心区在礼仪活动、社会阶层方面表现出更加复杂的现象并不是人口数量大、密度高、更集中的社区和更大规模政治结合的必然结果。

礼仪和祀祭活动对整合红山社会的重要作用已经被先前的研究重点强调,这种机制对东山嘴调查区内行政区之间的互动也十分重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将东山嘴祭祀遗址在修建、使用它的社区中准确定位。在其西北30公里处是牛河梁遗址群,那里集中了大量的红山文化祭祀地点,包括女神庙这样的独特设施。牛河梁遗址很可能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的宗教整合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这里可能是众人朝圣的中心,但本

地人口却很少。因此,探究牛河梁地区是否形成过像东山嘴和赤峰调查区那样的超地方社区群体将有助于评价这一观念。

红山社区经济方面的证据保留得很少。在周边区,富山庄提供了一个中等程度的生产分化和交换的例子,同时也是中等程度的财富和生活标准分化的例子。通过区域调查,在东山嘴周边发现了许多红山人的活动区,通过进一步精细地表采集,可以得到家庭层次的经济活动模式和社会地位的证据。这有助于评估红山文化核心区大规模的礼仪祭祀活动源于更发达经济的观点。

聚落形态研究给予我们关于区域人口和社区组织方面更深入的认识。同样,它也使我们对这些社区的内部动力和相互整合的关注点更清晰。它也为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其中一些在撰写本文时已有所考虑并将继续努力解决。

附记:本合作项目得到了中国国家文物局、辽宁省文物局、喀左县文化局、喀左县博物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地理协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亨利卢斯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本项目中方负责人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吕学明,美方负责人为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周南教授(Robert D. Drennan)和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柯睿思副教授(Christian E. Peterson)。参加调查的中方人员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达、吕学明、柏艺萌,喀左县博物馆侯申光,吉林大学学生褚金刚、陈小三、林森、赵永生,美国哈姆莱大学学生付天一。参加调查的美方人员有匹兹堡大学周南、学生丁山(James Thomas Williams),夏威夷大学柯睿思、学生亚当(Adam Joseph Lauer)、访问学者杰特拉(Chan Sovichetra,柬埔寨)。

执笔者 吕学明 柯睿思
周南 朱达

注 释

- [1] 严文明:《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见《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
-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牛河梁女神庙平台东坡筒形器群遗存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5期。
- [3] a. 同[2]。
b.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筒形器墓的发掘》,《文物》1997年第8期;《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一号冢石棺墓的发掘》,《文物》2008年第10期。
- [4] 魏凡:《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地点积石冢石棺墓》,《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
- [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998~1999年度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8期。
- [6] a. 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b.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0期。
- [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
- [8]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 [9]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 [10] a. Li Xinwei, Ritual and Residential: The Bang River and Laohushan River Surveys, Aohan Banner,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No. 24 (The Taipei Papers, Vol. 2), pp. 103-112.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4.
b. Li Xinwei,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Liaoxi Area, Northeast China.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821. Oxford: Archaeopress, 2008.
- [11] 邵国田:《概述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见《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 [12] a. 杨虎:《敖汉旗西台新石器及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年),文物出版社,1989年。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2002~2003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7期。
- [13] 同[10]。
- [14] a.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b. Drennan, Robert D., and Christian E. Peterson, Early Chiefdom Communities Compared: The Settlement Pattern Record for Chifeng, the Alto Magdalena, and the Valley of Oaxaca. In *Settlement, Subsistence, and Social Complexity: Essays Honoring the Legacy of Jeffrey R. Parsons*, pp. 119~154.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CLA, 2005.
c. Peterson, Christian E., "Crafting" Hongshan Communities? Household Archaeology in the Chifeng Regio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PRC.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06.
d. Peterson, Christian E., and Robert D. Drennan, Communities, Settlements, Sites, and Surveys: Regional-scale Analysis of Prehistoric Human Interaction. *American Antiquity* 70, pp. 5~30, 2005.
- [15] 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6册,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18]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

- 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 [19]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 [20] 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b.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21]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 [2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23] 同[10]b。
- [24] 同[14]c。
- [25] a. 同[20]。
b. 同[19]。
- [26] a. Earle, Timothy K.,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b. Mann, Michael,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7] 同[26]a。
- [28] a. Drennan, Robert D., Household Location and Compact versus Dispersed Settlement in Prehispanic Mesoamerica.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in the Mesoamerican Past: Case Studies in the Maya Area and Oaxaca*, pp. 273~293.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8.
b. Netting, Robert McC., Household Organization and Intensive Agriculture: The Kofyar Case. *Africa* 35:422~429, 1965.
c. 同[14]d。
d. Stone, Glenn Davis, Agrarian Settlement and the Spatial Disposition of Labor. *Spatial Boundaries and Social Dynamics: Case Studies from Food-Producing Societies*, pp. 25~38. Ann Arbor, Michigan: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1993.
- [29] a. Spielmann, Katherine A., Ritual Craft Specialists in Middle Range Societies. In *Craft and Social Identity*, pp. 153~159.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No. 8, 1998.
b. Spielmann, Katherine A., Feasting, Craft Specialization, and the Ritual Mode of Production in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 pp. 195~207, 2002.
- [30] a. 周南等：《区域性人口规模重建之尝试》，见《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b. Drennan, Robert D., and Christian E. Peterson, Methods for Regional Demographic Analysis. *Results of Systematic Regional Settlement Survey, Chifeng, Eastern Inner Mongolia*, Pittsburgh: Center for Comparative Archaeolog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in press.
- [31] a. 同[14]b。
b. 同[30]a。
- [32] Peterson, Christian E., and Robert D. Drennan, Patterned Variation in Regional Trajectories of Community Growth. *The Comparative Archaeology of Complex Societies*, edited by M. E.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press.
- [33] a. Drennan, Robert D., and Christian E. Peterson, Centralized Communities, Population, and Social Complexity after Sedentarization. *The Neolithic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edited by J. P. Bouquet-Appel and O. Bar-Yosef, pp. 359~386. New York: Springer, 2008.
b. 同[30]b。

（责任编辑 付兵兵）

本期要览

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 2007 年发掘简报 2007 年对唐户遗址进行的发掘,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 41 座、灰坑 169 个、沟 2 条、墓葬 1 座,出土了一批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物。这批材料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有助于研究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和聚落形态,以及建筑方式、生业形态、社会组织等。

辽宁大凌河上游流域考古调查简报 2009 年,中美科研机构合作进行了“辽宁红山文化社区项目”第一季田野调查。采取系统性全覆盖徒步方法,对大凌河上游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推算出调查区域内红山文化时期人口规模与分布特征,对该地区社区发展情况与内在动力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江苏镇江市铁瓮城遗址发掘简报 铁瓮城在三国孙吴都城中建立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由孙权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1991~2006 年进行的多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依山而建的城垣、城门、道路等遗迹,出土了种类繁多的文字砖、纹饰砖、瓦、陶器、青瓷器、金属器以及钱币等遗物,涉及孙吴、东晋、南朝等多个时代。

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 燕山南麓地区进入晚商后以永定河为界,存在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可以分成围坊和塔照类型,张家园上层文化可分成张家园和镇江营类型。塔照类型和镇江营类型在文化谱系上有承继关系,围坊类型和张家园类型则是前后替代关系。

从清源遗址看乌江流域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清源遗址是乌江流域的一处重要遗址。通过对其商周遗存与其他时间、空间有密切联系的遗址比较分析可知,乌江流域的商周考古学文化遗存都应属于三峡地区的石地坝文化,同时其陶器又深受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和鄂西路家河文化的影响,其细石器又源于川西高原传统。